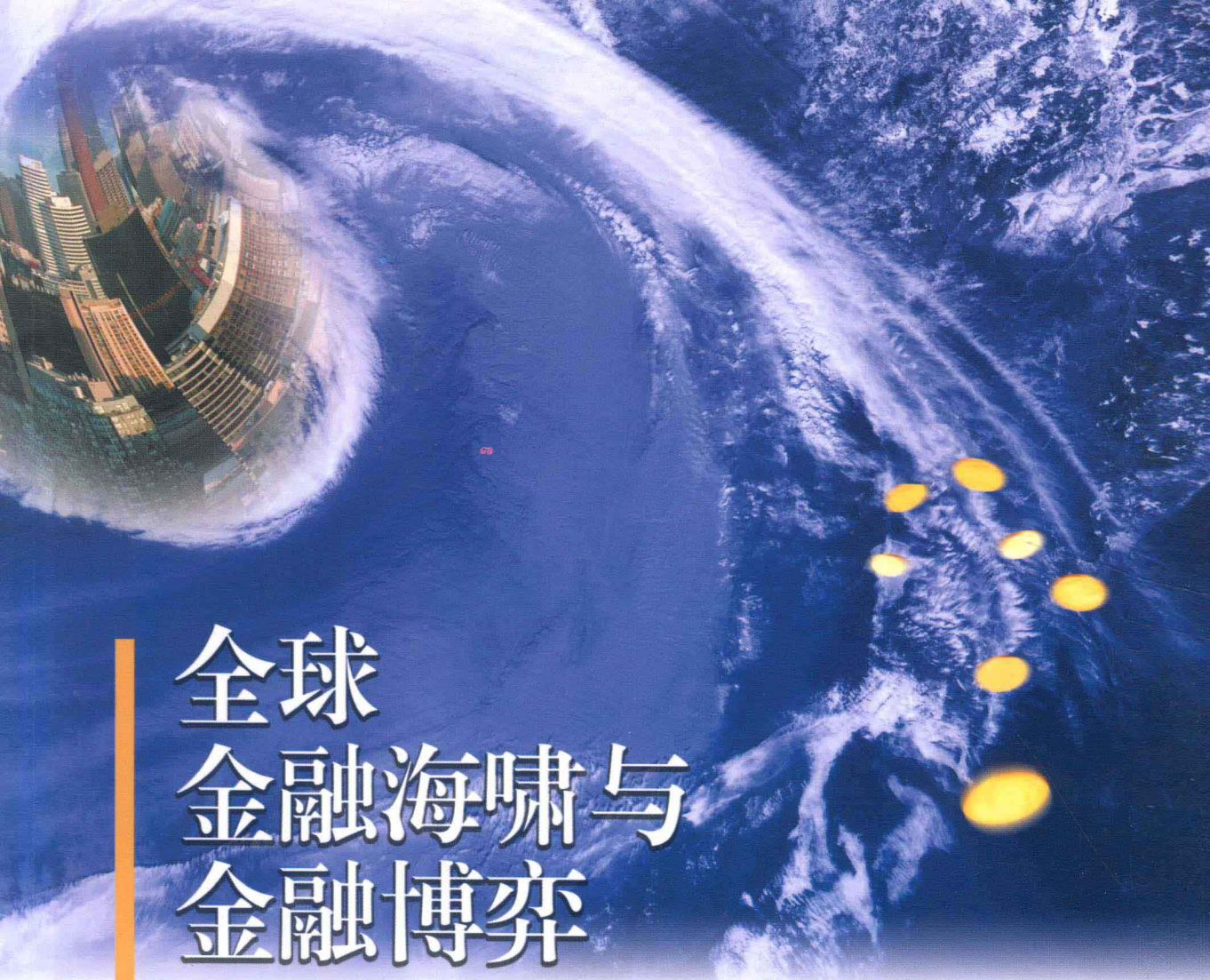




全球 金融海啸与 金融博弈

——超现代金融经济学视角与建构

Global Financial
Tsunami and Game in Finance:
Beyond-Modernism
Perspective and Construction

谭伟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全球 金融海啸与 金融博弈

——超现代金融经济学视角与建构

Global Financial
Tsunami and Game in Finance:
Beyond-Modernism
Perspective and Construction

谭伟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金融海啸与金融博弈:超现代金融经济学视角与建构/谭伟东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

ISBN 978 - 7 - 301 - 21686 - 6

I. ①全… II. ①谭… III. ①金融学 - 研究 IV. ①F8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5148 号

书 名:全球金融海啸与金融博弈——超现代金融经济学视角与建构

著作责任者:谭伟东 著

责任编辑:周 玮 姚大悦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301 - 21686 - 6/F · 342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em@pup.cn QQ:552063295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经管图书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8.25 印张 410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册

定 价:4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序言

制金权、国际大棋局与中华复兴

2049年将是人类现代史上最重大的史学断代或年代之一。百年当代中华,依照历史逻辑、政治生态、社会发展规律、政治—经济生态、文化脉络的合力推进,将出现拿破仑当年深以为然的睡梦中醒来的东方雄狮之震动世界的盛世局面。神州华夏巨龙,将再次腾空而起,翱翔于世,出入六合,在宇宙之间,俯瞰小小寰球。庄子大鹏梦,会成为当世的现实。

然而,金一南将军的必然性并不等同于现实可能性的告诫,是从当代中国的苦难辉煌的历史中凝练出来的。黑格尔的三段论,绝不代表现实自然而然的的可能性。战略机遇期总是危机四伏,陷阱密布。敌视的,红眼的,暴富的,曾经阔绰的,甚至依然贫困的,有时会在战略阴谋家的鼓动之下,形成暂时的战略联盟,随时随地伺机图谋打断复兴,阻碍新世界格局和秩序的形成。新一代领导集体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性突破瓶颈期,与此同时也将会面临如何借助伟大的战略反攻以及由此开启的历史性战略决战帷幕,尤其是在始终牢牢把握住最伟大的国际统一战线主导权之下,开启不足四十年的向着黄金时代的最后冲刺。

英国广播公司(BBC)经济编辑、畅销书作家彼得·杰伊所著的《财富的历程》,描绘出人类一万年文明发展史中始终上演着的世界财富华尔兹三部曲:创新、领先、富足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为财富华尔兹美妙旋律的第一曲;接着这些国家和地区就会遭遇周边野蛮的、后起的、落后的族群的觊觎、侵略、征服、颠覆和杀戮,上演血腥的第二曲;而后进入重新配置、整合甚至融合的第三曲。美国著名的耶鲁历史学教授约翰·肯尼思,当代最富创见的历史学大师L. S. 斯塔夫理阿诺斯,大卫·克里斯蒂安,通过《大国兴衰》《全球通史》《时间地图》这三部当代世界西方主流的大断代史和大历史的鸿篇巨制,展示出财富历程在文明、国家、国际社会的起伏跌宕中的残酷与疯狂。

当当代最负盛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传人,现世可能是西方最为博学、著名的哈贝马斯,始终沉浸在他的基于马克斯·韦伯的西方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沟通行动理论》模式之中而几乎不能自拔的时候,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

起源》两部著作，一改美国大众哲学家、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威尔·杜兰的羞羞答答的《东方的遗产》里的那种东方“欣赏”，把萨伊德开创的东方学、东方主义研究推向了历史的新高峰。

国际博弈，大国兴衰，世界格局，全球秩序，表面上比武的是硬军事和硬实力，间接过招的是科技与文化，实际和最终指向的是世界财富和国际财权。近现代最著名的国际银行家鼻祖，现代西方金融的幽灵式人物，罗斯柴尔德的名言是“如果我能控制货币发行权，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现代美国数十年的战略设计大师，基辛格的名言是“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地球上的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世界上的所有的人。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这里的金权、财权，可不是温情脉脉、装腔作势的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不是其表象上的那种所谓“货币最重要”教条，不是货币投放量的什么拇指法则之类的小儿科货币政策把戏。这里指的是制金权，是国民财富大流转和分配及国家存在的基石，世界态势与格局的形成基础，全球控制的战略资源操纵权，国际产品与服务流的定价权，世界财富的产权所有和国际分工体系与经济结构的生杀大权。

制金权早已不是中国古代兵法中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后勤补给。制金权也不仅仅是富有才华的乔良、王相穗的《超限战》中的金融、经济新安全观的敏锐发掘与捕捉。制金权也超出两位才华横溢的海归学者杨斌、宋鸿兵开创的隐蔽的经济战和货币战争的深度研究领域。制金权，把金融高边疆理论与战略，同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制信息权，连成一体，形成战略资源综合与战略态势匹配，完成非热战时期、温战与后冷战时期、新冷战时期的大战略统合。

对应于现代的美国地缘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和军事现代化幕后战略评估与战略规划大师安德鲁·马歇尔，以及国际政治思想设计大师约瑟夫·奈和罗伯特·阿特等所形成的美国单极世界的智能帝国主义，中国若想出奇制胜，完成彻底的崛起中的复兴与复兴后的真正崛起，就必须在华夏古典智慧、东西方全部遗产基础上，形成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大战略思想、大建政方略、大跨越式的发展理论，也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创新的时代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结构学说。

古代中国承载了世界与人类的众多重大历史辉煌。近代中国承受了世所罕见的苦难、贫困和屈辱。现代与未来中国承继着世界与人类的未来之诸多美好希望。制金权不是金融霸权主义，不是华夏一统天下，不是强权即公理的霸盘生意和霸权政治。制金权是以战止战，以力制约暴力，以金权统揽正义资源，整合天下民心与资源，形成最合宜的力量集结，造成全球战略对手不敢也无从骄狂的战略态势和积极大战略防御存在体系，并在全球合宜与公正的统战大势之下，完成新世界的重新建构。

美国以马汉的制海权和门罗的门罗主义，借助于林肯、罗斯福新政之对内校正和对外包装，逐步形成霸盘生意与霸权政治世界格局，其在杜鲁门主义和里根主义之下，达到巅峰。克林顿、老小布什，仅仅是凭借美国世纪或美国霸权的余威，而演出了几幕单边主义的独角戏而已。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和美国，甚至法国、德国乃至俄罗斯的制海权战略，还是美苏对抗，两极争霸的制天权，抑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制陆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制空权，都基本上是西方军事

战略思想。西方军事战略思维的基点是寻求绝对优势,绝对胜出,或在无可奈何态势之下的均势瓜分。在军事战略上,则基本上,除了巴顿将军的那种“进攻!进攻!进攻!”之类的“狂轰滥炸”外,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战略思想。

从门罗主义到“门户开放”,美国的世界战略指向是一贯的。美国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以及人口与疆域的巨大的回旋余地,不再追求历史上的世界帝国统治形式和赤裸裸的帝国—殖民主义。转而寻求分而治之,“有控制地解体世界”,远程打击,前缘部署,软实力较量与洗脑,摸索与模仿出一套“不战而胜”的美式东方古典战略。其在苏东、拉美陷阱之中,获得了休克震荡疗法的奇特功效。在其他的社会转型和一系列的“阿拉伯之春”中,也似乎频频得手。大体上是金元外交、美金非政府组织操作、舆论轰炸,并在战略关节点上,通过华盛顿共识的三大招数,即收紧钱袋子,管住物价,控制财政,一举陷对手于经济社会休克状态,造成社会流动性超级困境,资产大幅缩水,社会生活极度滑坡,人民愤怒,全面崩溃。然后欧美西方国家,以外资上帝的形式,进入接手,大肆剪羊毛,收拾金银,挖掘优质资产,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再把对手国经济大动脉,移接到国际超级的吸纳大通道之中,完成全球性的资本高速公路和输钱通道体系的建构。

弗里德曼的芝加哥男孩儿们,萨克奇式的经济杀手们,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以降,基本上得手了,但与此同时,也彻底葬送了新自由主义、新制度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命运。而2007年至今仍在阴影之下的美国超级金融海啸,则大体上为西方胜出画上了句号。西方模式、西化现代化与西方式的所谓历史终结,已经彻底失去了市场,更不要说什么西方式的光彩和沾沾自喜了。美国的当世精英,实际上都很焦虑;美国有头脑有直感的普通平民百姓,大体上都感受到了美国黄金时代的终结;西方稍有历史常识和现实政治—经济大算术能力的人,都几乎清一色从近一两百年的欧洲和西方霸权的梦境中醒来,开始了新一轮的当然是有些痛苦的西方霸权之前的所谓“亚洲霸权”的重新思考和再定位。

当西方对六百余年前,中国郑和下西洋时,远远超出全世界一切对手,甚至其之和的庞大先进海军和远洋舰队时,竟然在七下西洋后,悄然放弃对世界的殖民与征服而大惑不解,当他们对唐宋之变早已开启的中国工业化革命,重新省思,对照历史进程中的落后、野蛮的西方欧洲地中海经济与政治,当他们回望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就完成了大一统的现代化国家建构,统一政事,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统一车道,当他们再深入思考,回望他们一直不愿承认的中华首开植物、动物驯化先河,曾有过全世界或许仅存的伟大的三皇五帝时期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世间文明巅峰时,其曾有过的全部的所谓“上帝拣选”、“山巅之城”、“美国的天定命运”“就是控制亚欧大陆”的雄心万丈,顿时不但会灰飞烟灭,而且理所当然地会“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不过,历史的大对决与大较量,才刚刚开始。从一个边陲性的、破败与落后的西欧四分五裂的公国—邦国—岛国—城邦国集群,一路冲出奥斯曼帝国、莎菲帝国、莫卧儿王朝帝国,突破伊斯兰文明亚洲防线,冲击或事实上通过落后的欧洲之疾病病菌之哥伦布交流,征服美洲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文明,而后又横扫东亚、南亚、东南亚,直至远东中国,打开中国大门,杀戮、征服全球人民,西方在血与火的真野

蛮,科学与民主、法治与人权的假文明之下,竟然真的胜出了,确实胜利了。现代世界历史大师布罗代尔把西方的胜出叫做“上帝发错了牌”。李约瑟毕生献身于其惶惶巨著《中国科技史》,但却不得不抛出近代科学摇篮是西方而非中国这样的李约瑟之谜的历史追问。

我们不可能是浅薄的成王败寇主义者。我们古老和现代的历史自信与智慧、文化自觉,不可能使我们陷入到低级的力量崇拜和物质技术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之上。否则,就无法解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的辉煌及近代西方的所谓胜出。我们更不可能简单重复近代的所谓“落后就要挨打”和被炮制出来的“船坚炮利”之说。中国的领先与发达,不仅限于唐宋之变、汉唐雄风,远古三皇五帝的大政治、军事、文化更是横空出世。但不管我们的领先于世多么久远,无论我们从郑和下西洋时的绝对世界优势到康乾盛世时的绝对一相对世界优势如何近在咫尺,近代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事实上处于任人宰割的地步,整个世界事实上被西方征服了。

这就带来了双重的深度历史问题。第一是西方胜出的合理性在哪里?第二是西方胜出的历史偶然性和技术手段条件是什么?有了对前者的科学把握,我们就能破解西方必然衰败,把握重获世界生机的科学理论依据。有了对后者的清醒认知,就会具有清醒完整的手段策略和一般理性约束。

东方古典智慧是世界示权而非全球霸权。东方古典经济是勤劳革命,永久可持续发展,而非霸盘生意。东方古典文化是厚德载物,海纳百川,而非文化帝国主义。而近现代中华命运真正大逆转,中美苏大三角真正形成,世界大战格局真正被打破,正得益于毛一周一朱时代的“大道天理”之运生。毛泽东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大道朝天,各走一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等等,会形成华夏现代走向未来的智慧战略大通道,把东方式制金权演绎成天下无敌,四海同歌的伟大境界。

自周公、管仲以降的中华古典经济智慧,就是农政、农战大略之下的富国强兵之路。而民生、民本主义的要义在于积极的自由和民主民治。富国强兵的根基在于民富而社强。共同富裕而非阶级等级专制和社会制度性压迫,是社会主义制金权的生命线。有了制度性、结构性、文化性的共富与国强,则才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铜墙铁壁,全员动员,全方位集结,从而在商战、兵战、海战、天战的一切边疆和高边疆,无往而不胜。

制金权是逆转和重塑全球大格局的战略关键。现代化下,后冷战战略集结与战略制高点争夺,在于话语权、战略资源把握、战略态势的立体说服与示范。比直接战略打击更具战略威慑的是战略后续力和可持续性的战略资源整合与集结。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的正制与反制,海空天立体战的全方位破解,就是要求借助制金权支撑起来的整体战观和超限战略。钓鱼岛、黄岩岛、东海风波、南海风波等等,都不是战略对峙,仅仅是战术性试探。依照真正的战略对手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金融布局的谋划,后反恐时代已经开始,其建立在地缘性战略合围的已经大体完成之上。

全球大棋局大体上呈现在世人面前。西方、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辉煌,已经除了财富之外“一无所有”。当然,美国军事霸权的超强存在,可能还会沿袭二三十年。

马歇尔的陆军现代化释放出重大战略转移信号。但欧美霸权已经在丧失根基,在其一贯得手的金融整合方面,深深地陷入到了债务资本主义和泡沫经济的无底深渊之中。这种非理性繁荣,除了国家、企业、市民家庭的三重庞奇游戏,即靠借新债而倒卖旧债,靠信用债务资产来盘活经济,靠无穷尽地加大流动性,激活经济,制造虚拟繁荣,依赖实体产业空心化和产业回流的组合拳,已经不大可能再现西方文明的辉煌了。

作为一个历史上落后、贫穷的蛮荒之地,西方的近代崛起与胜出,无疑是令人吃惊的。不过,马克思对所谓希腊文明的成熟和东方文明的早产儿的判断,是不科学的。马克思沿袭了过多的黑格尔式的西方偏见遗产。

虽然我们正视西方文明的学习长足性和科学理性冲击力,但我们对西方文明中的致命性的奴隶制本位和财富物质主义异常清醒。这就从根本上把西化现代化的轨迹中的原罪和现罪清清楚楚地展示出来。西方大量地无代价地从东方特别是中国,获取了全部的现代化技术、科学、文化、制度、经济组合输入后,却不但对东方老师恩将仇报,征服并掠夺,盘剥加绞杀,而且制造了包括知识产权等一系列现代屏障,在知识和信息流转上,再度盘剥全世界。

世界与中国,包括发达的西方国家,都处在历史的新十字路口上,不是同一起跑线上。从历史惯性上,西方有近代优势,中国有古代优势。从现代支撑上,西方已经大体上丧失了战略整合力,中国潜在能量已经在大体上呈爆发态势。但生态资源可持续性和社会政治合道性,正在文化心灵深处,受到历史性的检验。要求大智慧,需要大方略,期待大政手笔。

“时来天地同借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华夏向来不缺精英。大智者,永远必须置身于民众的伟力之中,才能逢“时”走“运”。

牢牢把握住中国的制金权,把主权概念有效地扩展到适宜的方位,深刻洞视制金权不是简单的后继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制信息权的后缀。制金权更不是简单的货币投放权,而是制货币权、制财税和海关权、制汇率权和治外金融主权的联动,是在岸金融和离岸金融的全部权力统筹,是内外主权、全方位商战的金融财富权力的大战略统合。

私有化曾以自由化的名义,在全世界掀起资本全球化的巨浪,使得已经成为历史遗迹的食利资本又卷土重来,造成了举世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泡沫经济堆积和经济社会发展极度不公与不均衡。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并无法摆脱全世界的可能的金融黑洞陷阱。中国现代化的经济社会起飞和转型,无法完全独立于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之外。独立自主、有效科学地把握住进入和利用金融经济体系,唯一的上策和战法就是把制金权作为核心战略杠杆,以此来操纵命脉,发展中国,“经营”世界,造福人类。

金融博弈基于并胜于产业博弈和贸易博弈。产业和贸易博弈基于并胜于科技和教育博弈。一切商战和金融博弈,又基于并胜于世界的暴力的军事博弈。在长时段、大尺度和平与准和平时期,在全球化时代,金融博弈成为“存亡之道,死生之地”。因为价值轴心与价值尺度都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哲学伦理的、文化的、军事强权的实践理性的价值取向,被大量的显性的市场价值、商务民生价值所淹没和统合。国

家的较量、大国兴衰、国际棋局,依赖于世界的现实的直接的地缘金融。地缘经济与地缘文化,地缘政治组合,深深地依赖于世界资本杠杆的撬动与组合。国家与国际金融命脉和金融领域的大国较量,构成了综合实力的集成时较量和成为终极性的地缘政治与军事联盟的战略指向。

制金权与世界财富博弈,是现代大国兴衰的重中之重,构成世界秩序的核心基线,变成国家实力的根本所在。这才是亚当·斯密的“国防比财富重要”想说而没有成型的思想。这才是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和李斯特国民政治经济学这些真正引领西方崛起的经济学的尚未清晰的学说价值精髓。

谭伟东—

2012年9月15日

于美国芝加哥

目 录

第一章 当代金融经济的历史经纬与科学界定	1
一、从信贷革命到信用经济	1
二、大金融时代的金融逻辑结构特征	5
三、趋势外推失效: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11
四、风险社会:全新的金融生态和金融生境	13
五、金融专家化:结构金融、复合金融、金融工程	16
第二章 金融行为主体行为理论建构和博弈理论模块	18
一、金融行为主体论:集体无意识与交叉圆理论	18
二、金融行为主体论(II):自我结构	23
三、金融行为主体现象论:重叠角色理论(“六徒说”)	25
四、策略思维与对弈胜出	30
第三章 金融生态体系建构、学说构造与金融对弈	35
一、西方两种截然对立的金融生态观和金融生境基础及其可能的东西方融合	35
二、前现代金融生态体系基本架构回溯与历史挖掘式“猜想”	39
三、现代金融生态体系基本架构	44
四、超现代金融生态体系基本架构的未来展望与推断	48
五、简单性与复杂性共存的双向全球金融生态与生境演进	50
六、“竞争”(竞合)金融生境存活机制	53
七、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的两极产业与品种推进	55
八、最高金融生态有机机制:有机协同	57
九、金融盖亚假说与生态自优化和改进:最优生态系统	61
第四章 金融价值经济学理基础:价值源、价值链与价值轴	63
一、金融价值源理论重构	63
二、金融价值链:市场结构存在、确立与展开	71
第五章 资产通论、资产价格分析与市场直接博弈	76
一、现代资产分类	76

二、资产价格动态演进特性和通用资产价格确定	82
三、通用资产价格模型与理论拓展	86
四、多重溢价与多因素资产定价模型	89
第六章 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价格理论与博弈机制	95
一、金融产品(资产)价格机制理论	95
二、市场区隔、价位与价值链	103
三、金融市场的自然区隔与最优金融区	105
四、基本价值竞争轴变动与金融市场区隔	108
第七章 行为金融动力学微观基础架构与行为分析	109
一、动力全流程图解:诱惑、选择、期权、期货	109
二、诱惑展望效用论:经济与金融微观基础分析框架	113
三、选择动力学理论	115
四、期权、选择权掌控动力学理论	121
五、期货—现金流动力学理论	125
第八章 金融博弈:建仓、逼仓、倒仓与金融大战	129
一、金融兵法与金融战略空间	129
二、金融兵法与金融战式及其展开空间	138
三、大视角金融博弈理论架构	145
第九章 泡沫经济的金融学理应用与当代世界博弈运作透视	154
一、风险滞后的金融价值流转和账面“计量”	154
二、杠杆投入与膨胀效应	156
三、现金流之微循环支持	157
四、庞齐游戏链滚动	159
五、资产与财富升值蓄水池溢价的进一步刺激与支持	161
六、体外廉价贸易和要素投入支持	163
第十章 金融动力、金融部门结构与金融博弈	165
一、理性重塑:目的性、动机与动力	165
二、物理金融动力群	167
三、社会文明金融动力群	172
四、潜能金融:预期效应和霍桑效应	181
第十一章 金融价值与金融定价:大国崛起金融博弈	184
一、金融价值“度量衡”问题	184
二、定价经济的金融基础	187
三、价值轴变更与价值革命	188
四、国际基本竞争价值轴	191
五、金融价值起伏与全球财富转移	192

第十二章 国际金融失衡与国际体系大博弈	197
一、汇率经济的国际理性与非理性	197
二、国际经济与国际金融流转结构	203
第十三章 国际金融失衡与国际货币大博弈	211
一、美元的本位缺失和“美元本位制”国际金融体系的内在风险	211
二、信用锚缺失的美元本位缺失强化	225
三、美元财富本位缺失更深层的价值影响	227
四、汇率锚缺失的美元本位制缺失进一步强化	228
五、储备金制和贴现制人为操控与宏观短期弹性法	230
第十四章 国际金融失衡与国际资本大博弈	232
一、国际资本的均衡与非均衡和国际金融体系平衡	232
二、泛格雷欣法则:劣产驱逐良产,国际劣币驱逐良币	233
三、赢者通吃而非赢者诅咒:金融资本、食利资本与实体资本	235
四、正的世界利息率驱动、整合虚拟与实体经济	237
五、最大债权国变成最大债务国:美国国际资本净头寸逆转是国际资本失衡的根本症结所在	239
第十五章 国际金融失衡与国际储备大博弈	245
一、国际储备资产体系的合宜规范	245
二、国际储备资产体系三大失衡分析	248
三、现行国际储备资产体系的全球失衡态势	250
第十六章 金融战略制高点:认知与潜认知金融大博弈	260
一、金融舒适空间:形成、建构与动态调整	260
二、心理账户的形成、动态演进和结构保持	267
三、潜认知金融心理一行为结构	268
四、人性弱点与深层潜认知一行为偏好	271
五、小概率与大数辩证对应	276
参考文献	280

第一章

当代金融经济的历史经纬与科学界定

金融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化,不是由于顶级经济学大师和金融经济学大家的主观臆断和智力冲动造成的。金融经济的大体形成和国际金融博弈格局是资源配置在多重形态上,特别是文明和制度配置层次展开的当代必然结果。一般说来,形成某种学科意识建构和突破性学术进展是一回事,而相应地造成一种学术思潮,并引来众多的重量级人物参与,尤其是形成来自于各种水平与层次的广泛性的社会关注,如持续性地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于金融经济学领域,又如金融学界后继者颇为众多以及社会舆论和大众媒体对其相关领域空前高涨的热情与期待等等社会现象,则是另一回事。后者带有一种社会潮流与社会智力能量的特定集结,从而在其中必定会体现出深层的社会经济与金融关系的一些重大历史性变化。本书开篇就是要梳理和透视这些深层的本质性的社会变动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一、从信贷革命到信用经济

信贷革命和赤字财政,加上其他的金融变革,曾经造成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经济的时代过渡,并进一步演化到以至于最终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社会经济形态与特征。对此大变局,第一种解读叫做债务资本主义,第二种解读叫做超级资本主义,第三种解读叫做灾难资本主义(或将其称为休克主义),第四种解读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降的所谓创新,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信贷革命和信用经济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最主要的两大金融经济发动机。世界经济中心与富国俱乐部是如此,转型经济、改革经济和一切世界中心外的依附经济体也无不大大虚拟化和金融货币化。资本经济只是把实业和工业化作为一种技术经济手段和承载,并将工业化和制造业主导放置于一定的历史阶段。现如今,制造业经济让位于贸易经济,贸易经济让位于服务和创意经济,创意经济屈服于或臣服于信用金融经济。从而,虚拟资本和信用经济成了老大。

信贷革命持续的时间要比赤字财政历史长得多。应该说正是信贷革命的出现

大大强化了中产阶级的社会效应,直接刺激了甚至造就和扶植了所谓的美国梦,并使其在长达几个世纪中持续下去。而后信贷革命同福利社会和福利国家制度建构耦合在一起,共同参与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并形成了持续的影响。

信贷革命直接改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伦理观念,把融资同借贷消费和家庭理财,变成了现代家庭经济的主要金融活动方式。由分期付款的家用汽车开始,进而由汽车远距离运动的可能,造成城市的扩大和家庭居住房屋可以在较大范围和区域空间加以选择,结果,人口、工作(或职业)、厂家与商家的空间得以空前扩大与形成分散化倾向,从而不断加大扩张和刺激着城市经济规模的增大。反过来,过剩的产业能力(产能)与供给又要求不断深化的信贷链条与信用网络,以便产出得以完成市场价值实现。

分期付款在开始时是一种被认定为贫民的生活方式,但很快它就上升为整个中产阶级的乃至全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不依赖分期付款生存的仅占社会很小的比例,他们是这样的社会两大类:(1)最富有的,完全有能力以现金支付一切的,以及(2)最贫穷的,只能靠现金和食物券等生存的。金融与非金融机构由于最贫穷阶层的违约风险居高而拒绝给其以贷款。最富有阶层这样不但省去了每每定期付账单的麻烦,而且节省了大笔的利息支出。

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分期付款始于美国,是美国人的创造。其最初从汽车分期付款开始,而今最大的分期付款则是房地产业。按宏观、中观产业贷款规模大小排列,应该是这样的次序:住房、汽车、个人贷款(包括再抵押贷款、家居改进贷款和其他类型的贷款)、信用卡、学生贷款等。其中信用卡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而且随着其全部的支付项目电子化,信用卡完全有可能以更大规模进一步获得发展。同时,信用卡业的技术含量、人力资源、基础设施、金融管理模式均具有行业上和技术上的领先优势。

尽管新的革命最终主要指消费信贷,而且其大规模推广也确乎是从购买家用汽车开始,但无论是逻辑还是历史分析,分期付款应当首先从生产性工具开始。这符合历史逻辑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这种生产性工具系由一户独立的家庭农场主使用。而当时的金融信贷形式又不足以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据卡尔德在其《融资美国梦》中介绍,正是在手工业向机械工业转化的过程中,美国农场主首先熟悉了分期付款。他认为,1850年前,美国农民所用的工具同古时代的没有太大的区别。然而,美国农场和农户的经营规模从一开始就是上百英亩的“大农场”规模(相对于户均劳动力)。而他们在收获季节就必须面对在自然剥夺与损害之前,迅速收割、脱粒和扬谷(事实上,除了抢收还有抢种)。为解决这种矛盾,激发了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农机具创造:“从1840年至1890年,人们一个接一个的方式让美国农户用上了不同种类的脱粒机、收割机、摇臂收割机、收割打捆机、自动铁丝扎捆机、自动绳索扎捆机,以及最后出现收割脱粒或者叫联合收割机。”^①

这种机械化的效率优势一目了然:一亩收获从20小时降低到1小时。自然无须多少说明,农民们就明解其中的好处,甚或必要性。然而19世纪40年代中期一家农

^① 伦德尔·卡尔德著,严忠志译:《融资美国梦:消费信贷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场年均收入为300美元左右,而一台McCormick牌的收割机的售价为100美元。出路只能在于分期付款。

当然,城市人则是通过住房建筑融资,购买各种家具,尤其是家用缝纫机,而认识分期付款的。时间上比上述农机具信贷时间略晚二三十年。

尽管信贷革命是“美国制造”,且在美国表现得最为突出,但其由于金融发展的内在惯性和自恰性逻辑规律,已经变成了世界性的金融经济发展模式。

信贷革命对金融经济乃至整个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可从以下诸方面进行把握:

第一,信贷革命直接扩大了现行社会购买力,大大弥补了大众消费群体因工资与其他收入不足所造成的购买力短缺,从而在创造出虚拟经济支撑的“额外”、“即时需求”的同时,不但平滑了消费,也稳定和平滑了商业周期,至少是缓解了产能过剩的困境。

第二,在此基础上,信贷革命更进一步造成社会阶级或分层的影响,促成了在消费社会体系下,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整个大众群体的社会满足感和认同感,缓和了经济利益冲突与对立,从而至少暂时和表面上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与冲突。

第三,在传统的金融中介与产业之外,创造出了巨大的现代消费金融中介机构和产业群组,把个人理财、家庭储蓄理财与商家理财(或公司理财)、区域理财和国家理财连成一体。

第四,信贷革命彻底改变了金融产业群和金融价值链结构,并极大拓展了全方位金融经济的存在空间,从而为金融革命扫清了道路。

第五,信贷革命和消费革命联手,共同打造出了一个消费社会和消费国家,从而把社会分工体系和市场经济网络,加上金融连接平台推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结果便是不间断需求涌现并可以支撑一次次大大小小的金融革命。因为,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错综复杂,既造成了困境摆脱式或压抑解放式的金融创新,又引致了技术诱发式的金融创新。

信贷革命加上各种社会经济运动,推动了现代社会演进到信用经济时代。这个时代是历经了商业资本时代、工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时代,以及银行资本时代,而最后发展到了信用资本时代。

信用资本时代是一个以信用和财务杠杆为金融撬力,以多级原生金融、衍生金融品种与体系为金融工具,以信用管理系统为综合风险控制体系,以结构性、功能复合性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为开发对象,以各种财富、资源、要素为资产支撑的金融流动性加速运动体系为资源金融生态体系,以数理和各种智能化手段(包括数据挖掘、系统建模、随机拟合、经验判断、专家博弈)为金融工程操作,从而形成动态扩张的大金融产业集群和现代虚拟经济产业结构与价值链。

信用经济首先是一种彻底的虚拟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实物经济、实体经济依然是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是资本投向和消费活动的主要领域,但价值生成与流转角度,已经不再具有昔日那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这是由国际性竞争价值轴的转变及其经济发展相对论所造成的。其深层根源主要是精神与文化消费偏好转型,以及实体经济庞大的基础设施与存在的相对贬值(也就是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前

沿性、开拓性的下降),带来了价值评估体系、标准,尤其是人力资本蓄积生态的结构性变革,使得社会经济价值评判发生转移。这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差异和国家与国民利害冲突,强势国更多地掌握国际价值主导权,进一步造成对发达国家领先转型的偏爱和对发展中国家落伍状态之国际价值评价上的歧视。

在这种虚拟经济中发生了三个重大的价值估价的相对转型。第一是以知识为核心的精神与文化这类无形资产的价值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面的升值,甚至发生过度估值。这其中包括各种音乐、文艺、体育超级明星的大众文艺性产品和劳务的价值评估。第二是金融服务业与产业集群的价值比例的价值链占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高价位。而其就业规模、先进技术手段和社会影响力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是由电子信息虚拟网络空间和旅游商业广告中的疑似环境之创造来形成虚拟互动,把人类文明打造得更加远离质朴、远离自然,从而出现人造甚至神鬼般的美轮美奂的虚空状态,与此同时,其也在这种大众品味的转变过程中获得了少有的高价位评估。

由于这种价值评估的重大转变,不但传统农业价值比重大大下降,传统工业和制造业价值比重也在大大缩水,从而整个实物经济中的商贸与物流,甚至于国民经济基础设施这种有形的国民资产和财富都处于相对贬值中。只有房地产业和环境资源业的远期价值依旧被看好。

信用经济其次是全方位的信用风险管理与靠信用来驱动经济。收入与现货财富,无论是永久性收入,还是终身收入及其现值财货,甚至于手中的现期资本都不再是投资撬动和消费层级水平的直接硬性约束。在广泛的、大规模的、过度的信用刺激与使用的基础上,由直接收入水平决定的产销脱节与产能过剩,似乎神秘地消失了或被信用经济消解了。供给不是自动地创造需求,而是信用自动创造和推动需求。而且信用生成的弹性空间远远大于一般货币,甚至高能货币的作用空间。

这就使得社会经济发生了三大乘数递进变化:(1)从凯恩斯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开始,现代社会首次出现了赤字财政乘数。在经济衰退、萧条与不景气的时候,国家动用政府与全民经济信用,以赤字刺激经济,国民收入就会因财政支付的倍增效应而变动,从而通过财政乘数来放大赤字经济效益。由于经济低迷、产品过剩、产能与资源闲置,这种乘数效应是完全可能的。但滞胀现象与困扰基本上打破了这种乘数的过度神话,使其回归到一定的理性作用空间。(2)凯恩斯经济学转变到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实际上发生了由财政赤字乘数向货币乘数的转变。表面上看来,弗里德曼货币主义追求的是自然增长和长期的货币稳定,但其平均3%到后来的10%的年均货币投放(广义货币),由于货币本身的元金融性质和高能量性质,不可避免地导致货币乘数效应的广泛存在。这种货币主义信条同社会经济普遍性通货膨胀预期和指数化的工资、收入的衔接相互匹配,造成了货币效用的极度放大。(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同全面的经济放松规制相匹配,金融领域则以伦敦大爆炸、东京大爆炸和华尔街—芝加哥金融革命为代表,出现了金融大规模兼并、金融创新雨后春笋般出现和金融革命同时并存的金融巨变。这种巨变不但来自于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风险时代和风险社会等引发的现实经济发展推动,也直接奠基于微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和远程通信技术体系及基础设施机构的最终形成。金融创新与革命相互作用,最终完成了信用经济时代的构建。随之而来的便是信用乘数效

应广泛发生作用。财政乘数、货币乘数效应依然存在,但同信用乘数相比,其效用均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现代金融乘数相互叠加,交互作用。新经济时代的金融能量与金融杠杆效用空间的不断放大,直接推动着人类社会进入大金融时代。

二、大金融时代的金融逻辑结构特征

历史上出现的一定历史时期的泡沫与金融活络,充其量都只是金融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部门、某一行当和部分金融的充分作用,但同信用经济时代相匹配的却是一个大金融时代。当今时代,就如同大历史学(代表作如《时间地图》)等一样,要求研究者和人们拓展狭隘的学科视野,在更宏大的历史叙事背景和空间里展开其对问题的把握和事件的分析。大金融时代同时具有一定的内在结构性,从而并非是诸多金融领域、现象与事实的简单相加。因此,本书把重点放在这种逻辑结构的揭示上。

(一) 保险基础

大金融时代首先来自于风险经济和风险社会形成和存在这样一个根本事实。在这样的经济时代,不但有形资产,而且无形的金融资产,甚至全部国民财富乃至生存环境与未来发展,都处于或然性、不确定性与风险之中。事实上,一旦社会总量财富积累到一定水平与规模之后,风险灾难的损失和对其保值及加以保障,就具有了战略性意义,而且由于风险社会的国民财富本身又是存置于巨大的信用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结构之中,重大风险灾害的连锁效应就将是社会性的、全局性的。此外,微观经济与金融单位中的一些业已构成经济与金融帝国的经营实体,其微观经济行为中的一些重大项目影响深远。因此,那些重大的微观金融灾难就有了宏观灾害性质的影响。基于这一切,大金融时代的第一逻辑结构起点就是保险基础。

这种保险又细分为三大类:一是社会保障,二是商业性保险,三是介于政府与国家社会保障和商业性保险之间的社会互助、互利性质的保险。社会保障体系与制度的最直接推动来自于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障这两大社会经济不确定性。前者是解决现在生计问题,后者是把养老问题社会化(而非私人化、家庭内部化)的未来生计问题。此外,由于医疗费用的急剧攀升和教育费用问题(教育产业化的社会病),又加入了特定的医疗保险和社会教育保障。同时,主要是各种社会与制度安排以及某些个人疾病等原因,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从而引发了社会最低保障问题。

在最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方面,也包含着三个层级:社会贫困救助、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和慈善事业关爱。三级大体说来是逐级提升,选择性一个比一个更为增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良序上善社会的最基本体现。三者应分别轻重缓急,形成有效与合理的分工,从而保障公平,促进效率,提升福利水平,提高幸福指数效力。

在资本主义伦理价值中,要体现的是所谓的社会弱势群体同情与救助;在社会主义伦理价值中,要体现的应该是机会平等、集体关爱和共同幸福。

社会保险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社会生计保障和宏观经济社会波动保障。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席勒是通过诸如个人生计、房屋价值和宏观经济指数这种超级金融衍生品的设计,试图构建这种金融制度保障的。这就使保险原理与金融工程指数经济